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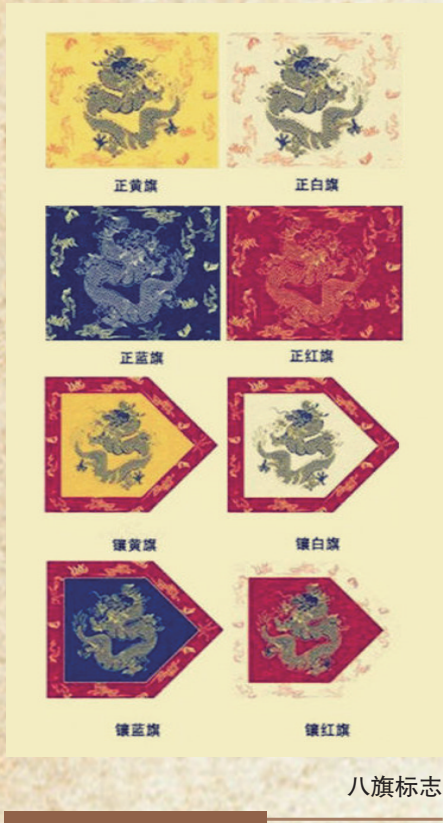


谈谈满族

关山复

满族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也是对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作出过重大贡献的民族，早已因灿烂的文化 and 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而闻名于世。

满族的先世很早就生息繁衍在我国白山黑水之间，是东北地区最早见于历史文献的少数民族之一。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肃慎人几经发展演变，至辽、宋、元、明形成女真人。明代的女真，从努尔哈赤崛起统一女真各部开始，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兴盛时期。这个兴盛时期的到来，注定了一个新的民族——满族的诞生。



八旗标志

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的行动给女真社会带来了几方面重大变化：

在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中，在原来的牛录制基础上，创立了组织更为严密、更富有战斗力的八旗制。

八旗是以正黄、正白、正红、正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八种旗帜为标志，兼具行政、军事、生产三种职能的一种社会组织，较牛录制要先得多。努尔哈赤率领八旗兵所向无敌，显示八旗制的优越性。在这种新的组织形势下，女真人逐渐成为严密的整体，不再处于分散状态，其结果是促使女真人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随着女真各部的逐渐统一，民族整体利益观念渐渐形成，振兴本民族的目标也日益明确。

统一的形势出现之前，女真各部长期处于相互征战状态。随着统一局面的形成，原来处于分散状态下的地域观念和本部利益观念日趋削弱。尤其是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誓师伐明之后，主要矛盾由内部转向外部，民族自我意识和民族凝聚力都得到了极大增强，民族心理素质 and 风俗习惯更趋一致。在这种情况下，满族不但强烈地感觉到了自身的存在，而且强烈地感觉到了自身的能力和力量。

满文的创新，给女真社会政治、文化和思想带来了更为有利的发展条件。

满文的出现对女真社会来说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一个丧失了固有的女真文字的民族，不但表现出其在文明发展中的后进状态，而且不可能成为一个拥有巨大影响力的民族。满文的出现促进女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民族意识的发展，使其社会制度更加完善，文化素质迅速提高，民族特征更加突出。同时为吸取外族（主要是汉族）先进思想文化提供了便利条件，而这种吸取对

女真向满洲的过渡起了推动作用。满文的作用还在于使本族人在内在心理和外在感觉上都明确觉察到了自身的独立性和存在的价值。语言和文字的结合也无疑增强了民族内部的联系，使内部的交往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所增加，从而增强了民族的整体意识。入关之后，满文还进而起了保存满语和风俗，以及作为统治工具的作用。

从努尔哈赤时代开始，女真人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揭开了自己主宰自己命运的新纪元，孕育了一个新的民族的诞生。

皇太极继承汗位以后，完成了女真各部的最后统一，使女真民族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并同时造就了满族诞生的种种条件。在此期间，皇太极进行了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方面的大规模建设。在政治方面，加强了君主集权制，设立了文馆和六部，初步制定了法律，完善了统治机构，加强了法制。经济方面，注重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颁布了一系列保护农业法令。实行了“编户为民”政策，制定了“离主条例”，确立了封建制的生产关系。在文化教育方面，发展了完善了满文，使满文更加便于推广和应用；下令翻译了有关政略和军事方面的汉字典籍；命令王公大臣子弟入学读书；首次举行科举，以选拔任用人才，使文教之风开始盛行。同时，他又极力强调实行“国语骑射”，反对“改满洲衣冠，效汉人服饰”，以保持民族传统、民族风俗和民族独立性。皇太极时期所采取的政策和措施，使民族意识和社会形态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其中又以1635年确定族名为“满洲”和1636年建国号为“大清”的影响最为重大深远。“满洲”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历史上一个新的民族的最终诞生，也标志着这个新民族的崛起和兴盛。“大清”的出现则表现出满族的强盛和民族自信心的强烈。可以说，在皇太极时期满族奠定了自身走向兴旺发达的基础，为统一全国准备了条件，成为满族发展的开端。

从康熙至乾隆，是清朝最为兴盛的时期，史称“康乾盛世”，前后历时134年。其时间之久，较之汉朝的“文景之治”和唐朝的“贞观之治”两者的总和还长一倍而有余年。

康乾之治，成就是宏伟的，影响是深远的。这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辽阔的疆土上实现并巩固了多民族祖国的大统一。从清朝定都北京至康熙三年（1664），初步形成了全国大统一的局面。当时的疆域，东部一线由库页岛至台湾；西部一线跨葱岭直至巴尔喀什湖；北部一线外兴安岭至贝加尔湖；南部直至南沙群岛。

促进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繁衍养育了我国众多的人口。康熙初年，平定了三藩之乱，治理了黄、淮和大运河，并禁止清朝贵族圈占土地，鼓励开荒。这期间曾三次颁布“出旗为民”令，后期又实行了“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这些政策和措施保护了土地所有权，缓和了阶级间和民族间的矛盾。只经过70多年时间，全国耕地面积就增加近六百万顷，即增加百分之三十四以上。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使全国人口数量猛增，康熙初年全国人口约为一千九百余万，到乾隆末期已接近三亿，是历史上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时期。至道光二十九年（1849），中国人口首次超过四亿。以后我国长期号称“四万万同胞”，就是以这个时期的统计为依据的。康熙时还摒弃了闭关自守的“禁海令”，鼓励盐商自行熬盐贩卖，允许清初被迫内迁的居民返回沿海一带谋生，允许商人出海经商。短短几十年就使宁波、漳州、广东等地成为繁荣的商港，苏州、杭州、江宁等地形成丝织业中心。在矿冶方面，康熙元年（1662）全国只有五个矿场，到乾隆四十八年（1783）已发展到三百一十三处。此时边疆的农业牧业和商业，以及与内地的经济联系，都得到了空前的繁荣。

平定叛乱，抵御外侮，保卫边疆。有清一代的前二百年间，中国是强盛的，曾多次平定叛乱，抵御外国殖民者的入侵，进行了一系列正义战争。举其大端，有以下诸役：康熙初年，经八载血战，消灭了三藩割据势力，巩固了全国统一；康熙年间，沙俄勾结蒙古准噶尔部噶尔丹汗，进攻内外蒙古，康熙三次率八旗军迎击，打败了噶尔丹军，安定了北部边境；康熙二十四年（1685），八旗军在东北兄弟民族的支持下，击败盘踞于雅克萨一带的俄国殖民军，迫使其与我议和，终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签订了《尼布楚条约》，从法律上确定了中俄两国东段的边界；雍正年间用兵数年，平定了西北噶尔丹策零叛乱，维护了西北地区的统一、安定；乾隆年间，两次出兵大小金川，平定了土司的叛乱，巩固和扩大了自雍正以来西南地区“改土归流”的成果，加强了西南边疆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乾隆二十三年（1758），派兵镇压新疆布那敦、霍集占叛乱，经过一年的奋战，终于将其消灭，结束了维吾尔族分裂的局面；乾隆年间，平定了西藏大农奴主的叛乱，两次击败在英国殖民者支持下的摩尔喀入侵者，粉碎了英国殖民者的颠覆阴谋，保障了西藏的安全。



满族风情剪纸

推动了中国科学技术和文学的发展。

在整个清代，康乾时期的科学技术发展最为迅速，凡天文、历法、算学、农学、水利、医药、冶炼、土木建筑等方面，成果都很辉煌。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重要的科学著作，如《晓庵新法》《古今历法通考》《律历渊源》《割圆密率捷法》《知本提纲》《授时通考》《行水金鉴》《医学源流论》等。同时进行了大规模的图书搜集整理工作，对继承发扬传统文化起了重要作用，其中规模最为宏大的是《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文学在清代是集大成的时代，凡诗词文赋、小说戏曲都成就斐然。除了出现众多汉族文学家之外，也涌现出许多满族文学家，其数量接近千人。其中纳兰性德以词名世，所作《饮水词》流传极广，影响深远，于清初被誉为“独树一帜”。曹雪芹所作《红楼梦》，更是家喻户晓，把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创作推向空前高峰。文康的《儿女英雄传》也饮誉一时。由满族人创制的《子弟书》，更是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一种文艺形式。总之，满族在中国文化史上的贡献，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历史进入现代之后，满族人民为祖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从辛亥革命开始，满族中就涌现出许多杰出的人物。如被誉为“关东革命第一人”的张榕和“满族共和革命先驱”的宝昆。又如鲍化南、何秀斋，同革命党人宁武一起，领导了辽宁凤城等地的武装起义，为革命献出了生命。出身满族贵族家庭的王俊，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参加领导了长辛店铁路工人“八月罢工”。不久，以工人代表身份出席共产国际会议，并见到了列宁。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满族人关向应，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南方土地革命，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政委。后任八路军一二零师政委，同贺龙同志一道开辟了晋绥抗日根据地，深受全党和人民的热爱。在抗日时期，东北初期义勇军中的满族著名领导人唐聚五、李春润、邓铁梅等。以后的东北抗日联军中，仅师长以上的满族干部就有李兆麟、王光宇、张兰生（鲍巨奎）、陈翰章、关化新、伊俊山、左子元诸人。在关内抗日战争中牺牲的满族名将有关显声、佟麟阁、吴克仁、白乙化等。在人民解放战争时期，东北野战军中的满族指战员有几万人。更多的满族人参加了地方武装和地方政权的工作。他们中的许多人为革命的胜利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新中国成立以后，满族人积极参加祖国的革命和建设，在各行各业中作出了贡献，取得了成就。站在他们前列的，有被誉为我国现代生物学“鼻祖”的秉志，有语言学大师罗常培，有蜚声海内外的人民艺术家老舍，有著名京剧流派艺术大师程砚秋，有著名相声演员常宝堃、侯宝林，在医学界，满族知名人士有白希清、吴英恺，以及其他许多光辉人物。

从满族形成到现在，经历了三百多年的漫长岁月，主要分布在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北、内蒙古和北京等地，而以辽宁东部和河北承德为多，在历史上早已形成高度的聚居区，1985年6月，在辽宁省建立了新宾、岫岩、凤城三个满族自治县。1987年5月，在河北省建立了青龙、丰宁两个满族自治县。1988年8月，国务院批准伊通建立满族自治县。1989年6月，国务院批准建立了辽宁省清原、北镇和河北宽城三个满族自治县，以及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1989年9月，又批准辽宁省本溪、宽甸、桓仁为满族自治县。有统计的分布于全国各地的满族乡镇也增加到近四百个。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全国各地的满族，精神振奋，经济、文化事业日益发展，各行各业涌现出许多先进模范人物。满族正与其他兄弟民族在一起，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了我们的中国梦，努力奋斗。

满族——这个古老而又年轻的民族，正在迎着新曙光奋力前行。

满族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当说到“满城”这个称谓时，却让很多人感到陌生。“满城”，即清初满族人聚居的地方，也称旗人聚居的地方，为满族旗人居住的一个集中点。现在，当我们掀开满族人的家谱时，往往还会见到这样的话，叫做“随龙当差”，或称“随龙征探”。这句话中的“龙”字，是指清太祖努尔哈赤。清太祖努尔哈赤起兵关外，待入关前夕，已经拥有大量的“八旗军”了。这些八旗军的首领与部下，都称他为龙。这些“随龙当差”，或“随龙征探”的人，待入关后，便形成了聚居点；由于某种原因，有些满族人再被派回祖居地关外。由此，无论在关内与关外，便都形成了一个居住的集中点。这个满族旗人居住的集中地，普遍地被称为“满城”。



杨子忱

满族与「满城」

满城的修筑，是否有围墙城壕，加以防护，倒不见得，但是，作为城中的房舍修建，却很有东北满族人生活的特点。一般都是“三合院”或“四合院”，偶尔有“五合院”和“六合院”。满族居住，系远古时期的“夏则巢居，冬则穴居”的居住形式发展而来。到辽金时代，开始由地下穴居转为地上室居。其居室，多为“座北朝南”，采取东南向口。其形成的院落，既像个口袋，又像个斗，故其俗称为“口袋房”或“斗室”。这些房舍中，称“三合院”的，由北面的一座正房和分列于东西面的两座厢房组成。“四合院”，则在三合院的基础上，加上一道门房。至于“五合院”和“六合院”，那就是在四合院的基础上，又多了一重或两重院落；或者说，多了一道或两道门房。现在辽宁新宾赫图阿拉山城，复建的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与母亲喜塔喇氏当年居住的院落，还保留着其当年的“三合院”院落样式。

到清王朝统治时期，院落产生了等级区分。其区别主要表现在其院落房舍修建的格局上，门前的“上马石”“下马石”和“拴马桩”的设置上，大门门扉上的铜钉多少上……大门上檐，往往悬有字号，称为“府”或“堂”。其中“府”前面冠以姓氏，“堂”往往是公所或作坊，如北京的“同仁堂”，吉林和长春的“世一堂”诸药店等。其门外的“上马石”，系主人出门骑马上马的地方，石头上有台阶，人可以登着台阶上马；“下马石”，为警示行人到这要下马，以示对宅院主人的尊重。为了起到这个警示作用，石头上往往都刻有“官员人等至此下马”的字样。

“满城”在清初有“满城四十八”之说。实际上，比这还要多。仅在关外，即东北吉

林境内，就有位于今永吉县乌拉街满族镇的“乌拉满城”，位于今松原市伯都纳镇的“伯都纳满城”，位于今黑龙江宁安市（当时隶属吉林）的“宁古塔满城”，位于今黑龙江依兰县城（当时隶属吉林）的“三姓满城”等。长春也有过这样的院落。笔者曾访问过原长春五十年代退休老教师孙永仁。据他说，他家原住长春市西三道街三义胡同，其先祖曾在这里修建了一个大宅院，很似北京的四合院，其房顶上有“五脊六兽”的雕塑，被称为“铜钹兽”；又因为其先祖曾跟随朱元璋打过天下，其十三世孙孙含中，做过乾隆帝的御师，又是翰林院学士，官居一品，乾隆帝曾赐匾，称其府为“方伯第”，故其家则被誉为“铜钹兽方伯第”。据说，当年其家在长春修建宅院时，有人不知他家的来历，以为超越格局，违反规定，以“大逆不道”之罪名，将其上告到清廷。后经清廷派人下来查访，又看了其家谱书，以及留存下来的御旨，才得以罢休。这个院落，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前后还存在着。孙永仁曾在里面居住，一直到读完小学。大约是在1958年前后，这个大宅院才被拆除。

清初满族聚居地，除有“满城”之称外，还有八旗“城营”和“驻防点”。八旗城营，也叫八旗“旗营”，当时在东北，就有八旗“旗营”近20个；“驻防点”，即少量兵丁驻防点，其当时的“驻防点”，有伊通八旗驻防点等。当年，这些“满城”“城营”和“驻防点”，都是满族设在汉族或其他民族间的居住集中地。其设立的主要目的是维护清朝统治者的统治和地方治安。后来，随着清王朝覆灭，“满城”留下历史印记，成为很多地方的特色地标。



（本版稿件由伊通满族文化研究中心提供）